

边疆少数民族农业文化遗产与一带一路文化交流

张 苏

(中国农业博物馆,北京 100125)

【摘 要】本文将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农业文化遗产与丝绸之路联系起来,旨在揭示古代丝绸之路与农业文化传播的关系。本文重点对草原丝路的远古农业交流、西南丝路的茶马古道、沙漠丝路的农业交流、海上丝路的农业物种传播以及丝绸之路上的农业文化传播者等五个部分进行阐述。通过对我国不同时期丝绸之路上的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为今天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供历史的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少数民族;农业文化遗产;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7)01-0129-07

The Agricultural Heritage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s Border Areas and the Culture Communic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ZHANG Su

(China Agricultural Museum, Beijing 100125)

Abstract: This paper connects the agricultural heritage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s border areas with the Silk Road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lk Road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Agriculture. The study mainly focuses on five topics: the agriculture communication along the Grasslands Silk Road in ancient times, the Ancient Tea Horse Road of the Southwest Silk Road, the agriculture communication along the Desert Silk Road, the transmission of Agro-species along the Sea Silk Road. By studying the agricultural heritage along the Silk Road in different times,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some historical reference to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Key Words: ethnic minorities; agricultural heritage; the Belt and Road.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信息化的世界格局下,我国政府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提出了与欧亚各国共建促进经济要素有序流动、经济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交流深度融合的战略构想,建设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共同体。在国内,“一带一路”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括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广西、云南、西藏、重庆 13 省市;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括上海、福建、广东、浙江、海南 5 省市。

在古代,我国与世界通商交流的国门边关很多。1877 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的《中国》一书中,首次把西汉时期开辟的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丝绸贸易通道称为“丝绸之路”。但

【收稿日期】2016-11-16

【基金项目】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基金 2015 年度青年项目(ZNB2016-Q06)

【作者简介】张苏(1974—),女,中国农业博物馆馆员,主要从事农业文化遗产和农业文化研究。

是李希霍芬提到的只是人们最为熟知的经过新疆的“沙漠丝路”(或称“绿洲丝路”),实际上我国古代还有着许多条通往世界各国的“丝绸之路”。

近代考古学发达以后,对我国古代的外贸通商道路已经有了更多的实物遗址证据,有了更多的了解。如果以开通的时间顺序排列,我国最早开通的是经过蒙古高原的“草原丝路”,其次是经过西南的“西南丝路”,第三才是李希霍芬 150 年前写到的经过新疆的“沙漠丝路”,第四条是东南沿海的“海上丝路”,这条海上丝路还可分为北路、中路和南路等三个出海港口。

一、草原丝路的远古农业交流

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较少提到古代中外交流的“草原丝路”。因为这条文明通道远在文字出现之前就已经开辟出来了。远古时期,我国先民开通了草原通道,与中亚、西亚甚至欧洲的早期文明进行了交流。我国考古发现的史前时期的小麦、绵羊与马(这种马是古代印欧人首先在黑海—里海北岸培育成功的)是从中亚或西亚地区引进的。这说明草原丝路自古以来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交通要道。早期的中国家马,应当是从这条重要通道引入的。还有一些技术如交通工具马车、青铜冶铸、金器、玻璃器(钙钠玻璃)等,也可能受到东西文明传播和交融的深刻影响。

大约公元前 4000 年,我国仰韶文化中晚期,这条草原丝路从蒙古草原延伸进到中原地区;公元前 3000 年,传入到黄河上游、川西北地区及河西走廊西部;之后,西进至新疆哈密,来自东方的蒙古人种与从新疆北部南下的原始高加索人种,在哈密发生碰撞和融合^①。

内蒙古自治区的敖汉旱作农业系统和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正是这条通道上留存的古老农业文化遗产。敖汉旗的粟文化与同时代西亚的麦文化,正好在这条文明之路上交流融合,绝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人类两大文明的沟通和对话。文明早期的状况,我们今天依然知之甚少。敖汉旱作农业系统和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在古代所达到的文明高度,不能以今天的状况去衡量、去判断,这是我们认识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的重要尺度。

可以肯定的是,敖汉先民是开启农耕文化的先驱。在当时,他们所处的地位不是在边疆,而是文明的核心和交通的要津。今天广为种植的小麦和普遍饲养的绵羊,如何在史前时期就从遥远的西亚来到中国?历史文献没有详实记载,只有通过草原丝路的深入考古,才能揭开其历史尘封的面纱。这就是边疆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所在,魅力所在。

作为重要的早期文明通道,草原丝路带动了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向西方传播。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西亚和东欧的冶金铸造技术,很可能是通过这里从中国传播过去的。因为现代塔吉克语和俄语的“铸铁”一词的发音,都与汉语的“铸”字发音相近。还有,强大的安息王朝也是从我国输入铁器制造技术。从公元前 2 世纪开始,位于土库曼斯坦的巴伊拉姆阿里城附近的“木鹿城”成为中国铁器的贸易集散地,当地把铁制的兵器和工具都冠以“木鹿”前缀,以示其产自中国,是品质和品牌的象征。例如,在罗马史学家普鲁塔克(46-120)的著作中,就把安息骑兵所使用的锐利兵器称之为“木鹿武器”。可见当时中国的铁制兵器通过安息流入了罗马。

到了公元 4-11 世纪,草原丝绸之路成为东北亚的国际交通路线,对中国、朝鲜和日本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有着极重要的作用。草原丝绸之路从中国往东发展,进入了朝鲜半岛,然后通过马海峡到达

^① 李水城:《东风西渐:中国西北史前文化之进程》,文物出版社,2009 年;郭物:《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日本九州。日本考古发现的大量中国文物,其中不少就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传播过去的^①。与朝鲜一江之隔,与日本、韩国隔海相望的辽宁宽甸柱参传统栽培体系和桓仁京租稻栽培系统,也是古老的草原丝路上的文化记忆。中朝韩日的人参栽培和人参文化,是否与草原丝路有着直接间接的联系,仍然需要深入探讨和挖掘。

二、西南丝路上的茶马古道

西南的“丝绸之路”是我国古代第二条对外贸易通道。它的开通时间要早于经新疆通往西域的沙漠丝绸之路,因为张骞出使西域时,曾在今天的阿富汗见到了从印度运去的“蜀布”。这说明在汉初的张骞之前,中国西南部已经与印度有了商贸、文化来往。近年在四川、云南的考古发掘显示,西南丝绸之路可能在更早的夏商时代已经存在。其有力的证据是,在云南大理、晋宁、曲靖等地的夏商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产于印度的齿贝和象牙。

需要说明的是,西南“丝绸之路”的称谓,是与后来更为有名的从新疆通往西亚的“丝绸之路”对应而言的,其实南方的对外贸易商品主要是“茶、盐、棉布、药材”等货物,“丝绸”所占的份额并不大。

“西南丝路”是通往南亚次大陆的崎岖山道,货物负载主要是马、牦牛的驮运或人的肩挑背扛。这条道路分为东路、中路与西路等三个方向的支道。东路经由成都、贵州西北、广西、广东下南海;中路是由成都、云南、步头道、桑道至越南;西路又分为两道:即身毒道和五尺道。五尺道可从云南进入缅甸,身毒道可以到达现今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马尔代夫、锡金、不丹、尼泊尔等许多国家。

西南丝路上的茶马古道,一般也分为三道:

北道从思茅至昆明,然后北上直至京都。以运送皇家的贡茶为主,后来“普洱茶名重京师”,思茅所有茶叶都凭附普洱声名而流向中原各地。北道因此马帮络绎,拥堵不堪,干则一路尘土,雨则一路泥泞,于是在道光六年(1826)朝廷特许官赏铺以条石,历时30年,修筑成昆明至思茅的五尺道。

西道向西北,经思茅、下关而达大理。在大理再分为两路,一路经保山入缅甸、印度直到西亚和欧洲,是我国最早沟通欧洲的南丝绸之路。另一条向西北经大理、丽江、拉萨再到尼泊尔、印度,是一条穿行于滇西崇山深壑中的艰险古道,也是亚洲内陆最为复杂的商业古道。

南道也分为三线。向东出老挝越南;向南出缅甸泰国;向西出缅甸印度。南线的茶马古道的三个方向的线路,都是以思茅或者西双版纳为起点,可以算五尺官道往南延伸的外贸商道^②。

复杂艰险的西南“丝绸之路”,是我国与南亚交流的主要通道。最初多由宗教传播而兴,后来发展到包括农业在内的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云南的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双江勐库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漾濞核桃—作物复合系统、广南八宝稻作生态系统、剑川稻麦复种系统等6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都处于西南丝绸之路上,云南是我国民族农业文化遗产最多的省份。

探寻西南丝绸之路的文化古迹,我们会发现许多与农业文化遗产相关的历史印记。例如,古代印度产的摩拉水牛引进云南腾冲后,经与当地的中国水牛杂交而育成的役乳两用的槟榔江奶水牛品种,至今仍是我国独特的奶水牛品种。又如,选育而成的水稻品种,经西南通道而进入南亚各国,还有与之相关的农业生产技术,都在运送茶叶的商道上川流不息。中国的工艺品、作物种子、生产技术,得以传到南亚次大陆。梵语称桃子为“秦地持来”,称梨子为“秦地王子”,对钢铁、红铅、樟脑等的称谓中也冠以“秦地”字样。

① 刘庆柱:《丝绸之路的考古认知》,《经济社会史评论》2015年第2期。

② 赵潜恋:《中国少数民族茶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26-31页。

总之,西南丝绸之路,形成于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或者汉代之前,是一条深藏于高山密林间的全球化贸易、文化通衢。它是我国最早的与南亚次大陆联系的纽带,对古代中外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沙漠丝路的农业交流

著名的“沙漠丝路”(或称“绿洲丝路”)是由官方开辟的政治之路、外交之路。它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历时最长的洲际交通要道。正因如此,我国古代所有的对外通道一律称之为“丝绸之路”,甚至出海通道也被冠名为“海上丝绸之路”。可见这条沙漠丝绸之路影响之大。汉初,为了加强与西域各国的友好交往和巩固边疆安全,先后在甘肃河西走廊设立酒泉、武威、敦煌和张掖郡等四郡,尔后又在今新疆地区设置西域都护府,府治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大力开展屯田驻兵。这时,西域成为汉王朝的一部分,西域各族成为中华民族的成员。为了打通都城长安与遥远的西域边关以及关外各国的交通联系,汉朝政府倾国家之力,开辟了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①。

在西域丝绸之路西北端的北疆奇台县,至今尚有一座东汉时期的古城遗址,城址内出土了大量汉代文物。考古学家考证,它可能是汉朝官署的疏勒古城^②。当时,北疆是游牧民族生活的地方,也是中原王朝争夺草原控制权的前哨和基地^③。2015年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新疆奇台旱作农业系统”,正好处在丝绸之路的关隘要地上,是名符其实的历史悠久的农业文化遗存。它不仅是内地农耕技术向边疆传播的重要据点,也是中华文明向西域各国传播的重要通道,更是我国自汉朝开始在奇台设置官署的历史见证。

新疆吐鲁番坎儿井农业系统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内地农业技术进入东疆地区的物证,承载着许多重要的历史记忆。据考证,吐鲁番坎儿井的修建技术,源自关中渭北地区的“井渠”。《史记·河渠书》记载:“武帝初,发卒万余人穿渠。自征引洛水至商颜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赖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④这里的“井渠”实际就是“坎儿井”的模板,文献记述中的“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技术特征,几乎与坎儿井的修建技术完全一致^⑤。

随着汉朝对西域的开发,屯田养兵,发展农业,就地供应军粮成为当务之急。于是,一些来自中原特别是关中地区的官员和将领,因地制宜地将关中的井渠技术应用到新疆的屯田水利之中,产生了今天的坎儿井最早技术雏形。《汉书·乌孙传》载:“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案行卑鞋侯井,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坎儿井在沙漠绿洲中能有效防止水分的大量蒸发和浪费,是一项便利而有效的方法。

当坎儿井技术在新疆东部的哈密一带推广普及之后,当时活跃于中亚的贵霜帝国统治者在与汉朝边疆军民的交往甚至战争中,逐渐发现和掌握了坎儿井的技术要领,并将这种技术引入中亚地区。贵霜人在接受坎儿井的灌溉之法后,又根据自身情况,因地制宜,加以改进。它们在接受峻峭山坡上溪流的主水渠口开凿隧道式的引水渠,并建造跨越峡谷或山脊间裂缝的导水管。这是对灌溉系统的提升

① 刘庆柱:《丝绸之路的考古认知》,《经济社会史评论》2015年第2期。

② 薛宗正:《务涂谷、金浦、疏勒考》,《新疆文物》1988年第2期

③ 戴庸佐:《东疆古碑巡礼》,《新疆文物》1988年第4期。

④ 《史记》卷29。

⑤ 关于坎儿井的技术来源,学术界有汉代井渠说、波斯传入说和新疆自创说三种观点。参见王春峰:《国内外坎儿井综述》,《地下水》2014年11月。本文作者赞同第一种观点。

和发展。贵霜帝国是原先在西域地区的少数民族“大月氏”西迁中亚以后建立的。后来发展成为与汉朝并列的古代世界四大帝国之一(汉朝、贵霜、安息、罗马)^①。《史记·大宛列传》云:“宛城新得秦人,知穿井”。穿井技术,就是地下暗渠的坎儿井。元代刘郁的《西使记》说:“穆锡地无水,土人隔岭凿井,相沿数十里,下通流以溉田”。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认为坎儿井修建技术系中国古代发明。他肯定地说道:“余谓此中国旧法也”,“盖东来贾胡以此土法传之彼国者,非由彼土传来也。”^②

汉代以来,我国从这条沙漠丝路上引进了许多动植物。例如,从西亚引进了绵羊、山羊以及许多奇禽怪兽,如罽宾的封牛(瘤牛)、象、大狗、沐猴;乌弋山离的桃拔(符拔)、狮子、犀牛;安息的狮子、符拔;条支的大鸟安息雀(即鸵鸟,当时又称大爵),等等。到隋唐时代,经这里引进的作物更多。例如,蔬菜有莴苣、菠凌菜、苕苕菜(甜菜),水果有波斯枣(海枣)、巴杏旦(扁桃)、菠萝蜜(树菠萝)、齐墩果(油橄榄),等等。还有以产地命名的消暑水果西瓜(西域瓜)。

与此同时,我国许多农业物种和技术也通过这条通道传向中亚、西亚和欧洲地区。例如,前面说到的坎儿井农业灌溉工程、新疆地区原产的哈密瓜栽培技术、奇台传承的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系统、中国的大量传统农具和畜力耕作技术,中国蚕丝技术、茶叶栽培技术和加工技术,等等。

四、海上丝路的农业文明传播

考古学发现,我国先民的海洋意识在殷商时代就已经萌生了,时至今日超过 3000 年。安阳殷墟发现的 3000 年前的甲骨文龟板,系来自马来西亚来的“亚洲大陆龟”;殷商时代器物上刻画的犀牛形象和青铜器的犀牛造型的艺术铸件,战国秦汉时代流行的铜犀牛,以至汉武帝茂陵陵区出土的错金银铜犀牛,等等,作为其艺术原型的犀牛可能来自南亚地区。印度犀牛个体较大,而苏门答腊犀牛个体较小。这说明,中国古代的犀牛及其作为模型的犀牛,都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③。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在“中国猪种”条目中说:“早在 2000 多年前,罗马帝国就引进了中国猪种,改良他们的原有猪种,而育成了罗马猪”。据考证,词书中所说的“中国猪种”,是当时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从广州出发,由海路经印度传至欧洲的罗马。这是广东猪早期的外传途径。晋代曾有罗马特使经广州来中国朝贡,可知公元三世纪已有罗马人由海路往来于广东。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描述我国当时的远洋商船时写道:“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拖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④。一艘大船,居然可载几百人,并且备有一年的口粮,而且能在船上养猪酿酒。猪种与马牛羊驴骆驼不同,草食动物可以在遥远的运输途中就地取草饲喂,随同商队步行,即使旷日耗时,也能从甲地到达乙地。猪种大概只有在“舟如巨室”的船中喂养,才能跨洲越洋外传了。

到了明清时代,随着世界上远洋航行的发达,美洲新大陆的开辟,越来越多的原产美洲的作物经过“海上丝绸之路”,绕道欧亚两大洲,相继传入我国。这时传入的作物有红薯、玉米、辣椒、西红柿、马铃薯,还有番桃、番木瓜、洋葱、洋梨、花生、甘蓝、菜豆、南瓜、荷兰豆,以及“吸烟有害健康”的烟草,等等。当时通过多种途径引进的这些原产美洲新大陆的作物,对我国的作物结构产生很大影响。

华南地区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濒北部湾,面向东南亚,西南与越南毗邻,是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

① 王宏谋:《贵霜帝国及其与两汉的关系》,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年,第 34-36 页。

② 王国维:《西域井渠考》,《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391 页。

③ 刘庆柱:《丝绸之路的考古认知》,《经济社会史评论》2015 年第 2 期。

④ 《岭外代答》,宋代汉族地理名著。周去非撰,共十卷。周去非(生卒年不详),字直夫,浙东路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南宋孝宗淳熙(1174-1189)初,周去非曾“试尉桂林,分教宁越”,在静江府(今广西桂林)任小官,东归后于淳熙五年撰此书。

海通道,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交往非常便捷。该区有龙脊梯田农业系统和隆安壮族“那文化”稻作文化系统,都与东南亚稻作文化的形成发展密切相关。通过海上丝路,中国先进的稻作栽培技术和育种技术源源不断地传播到周边国家,既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农业进步,也加深了与周边邻国的友谊和交往。

有学者研究指出,“那”是壮泰语汉字“水田”的音译,有些也记作“纳”,并且被广泛嵌入乡村地名,因此我国南方甚至东南亚的邻国,许多地名都有“那”字。从地图上可以看到,东起我国的珠江口,西到缅甸西南部,南起泰国南部、越南中部、老挝和我国的海南省,北到我国的贵州省中部,这一个广大的区域内,分布着大量的“那”字地名。形成一个涉及东南亚和南亚许多国家的“那”文化圈。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对于农业文化遗产传播的重要作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丝绸之路最兴盛之际,也是中国最昌盛之时。哪条丝绸之路最兴盛,就说明中国与之对应的那个地区最兴盛。比如,草原丝绸之路最兴盛的时候,也是中国北部地区最兴盛的时候,那时候的敖汉地区已经选育出中国最早的粟品种。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主体农业文化已经发展起来了。汉唐时期,国家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在黄河流域,通往西域的沙漠丝绸之路就接着兴盛了。唐宋及其以后,隋炀帝大运河的开凿,国家政治中心东移、北移,首都从长安、洛阳的两京地区东移到开封,宋代以后一直移到北京,经济中心移到东部沿海,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发展成为我国主要的对外贸易通道。

由此可见,我国古代的丝绸之路总是与国力强大、经济繁荣的“盛世”紧密相连。沙漠丝绸之路始于张骞通西域,汉唐也是中国最繁盛的时期。两大盛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都在汉唐丝绸之路时期。这就是丝绸之路与国家政治经济以及农业生产水平相联系的历史密码。今天,我们在现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提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一带一路”战略,正是时势所致,任重道远^①。

五、丝绸之路上的农业文化传播者

文化传播归根到底是由具体的人来执行、来完成的。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许多人艰难地在这些风沙弥漫、艰险崎岖风险难料的丝路上跋涉。默默在进行着农业物种和农业文化的传播和传承,扮演了文化使者的角色。

外交官 在古代,由于交通、语言、风俗、信仰等等方面限制,有机会出国的人非常少,甚至贵为天子都很少能够出访友邻。但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各国还是不停地派遣或接待外交使节。这些肩负使命的使臣,常常能够在出使国居住较长时间,能够比较深入地了解出使国的农业和文化,能在回国述职或任期届满时通过合法或私下的途径,带回当地的品种或技术,有时就成为农业技术传播的使者,担当了引进域外农业物种的重要角色。

在历史案例中,最典型的是汉代的张骞出使西域。西汉时的“西域”既是地理概念,也是政治概念。今天讲的“西域”包括中亚细亚、印度、伊朗高原、阿拉伯半岛、小亚细亚乃至更西的欧洲地区。这个广大地区是世界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波斯文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都在这里汇聚。

作为张骞出使西域的成果之一,就是从西域引进了葡萄、苜蓿、黄瓜、蚕豆、青葱、大蒜、胡椒、芝麻等作物,改变了我国的作物结构和食品构成。此外,在张骞的回国报告中,极言西域马匹之强盛,“大宛……多善马,马汗血”,引起了汉武帝的浓厚兴趣,下令从西域引入了大宛马和乌孙马。两汉时期从西域引进的大家畜还包括大量的驴、骡、骆驼等等,成为中原地区的重要役畜。

国外的使者也会在礼赠或进贡中送来外国的物种。如朝鲜一些农业物种及生产技术也是在外交

^① 刘庆柱:《丝绸之路的考古认知》,《经济社会史评论》2015年第2期。

的过程中逐渐进入了中国。汉桓帝年间(147-167),即从濊国(位于朝鲜中部)引入著名的果下马:“(濊国)又出果下马,汉桓时献之”。裴松之注曰:“果下马高三尺,乘之可从果树下行,故谓之果下。”其它的朝鲜特产诸如檀云、斑鱼皮、文豹、人参等等,也都通过“外交通道”的途径相继进入了中国。

我国的养蚕和丝织技术,也都是直接或间接通过外交使节的方式先后传遍世界的。公元前11世纪就已经传到了朝鲜。秦汉时期,日本人多次派使臣到我国和朝鲜取经,并通过外交途径招收我国蚕业匠人去日本传播技艺,从此养蚕业在日本得到发展。公元7世纪,养蚕法传到阿拉伯和埃及。10世纪传到西班牙。11世纪传到意大利。15世纪蚕种和桑种被带到法国,从此法国开始有了栽桑养蚕缫丝。英国看到法国养蚕获利,便效仿法国,于是养蚕生产又从法国传到了英国。这些事例都说明,历史上的外交家们对于农学的世界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商人 与外交家的经历相似,商人特别是远离家乡、跨国经商的商人,他们见多识广,能力超人,他们会在经商过程中,将甲地的先进农业技术或者优良品种传播到乙地,也会将境外的、域外的农业技术和品种带回祖国,带回家乡,成为传播农业文明的使者。

在这些通往世界的丝路要道中,“沙漠丝路”(或曰“绿洲丝路”)是官方开辟的外交通道,也是历代中西交往的要道。汉代从这条丝路上引进了许多作物。此外,还从西亚引进了绵羊、山羊以及许多奇禽怪兽,如罽宾的封牛(瘤牛)、象、大狗、沐猴;乌弋山离的桃拔(符拔)、狮子、犀牛;安息(安息)的狮子、符拔;条支的大鸟安息雀(即鸵鸟,时又称大爵),等等。

官员 我国古代规定官员任命,要实行籍贯回避制度,即当地人不能就地当官。因此,历代各色官员,当他们被派往外地当官或任期调动时,就能把他家乡的农业技术传到当官的地方,也能把当官历程中的农业见闻,带回自己的家乡。总之,历代官员在农业技术传播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比如,吐鲁番的坎儿井技术,奇台的小麦雨润农业技术、哈密甜瓜传播,首先都是官员或将领们带头推行的结果。

兵士 兵士是传统乡村中见多识广的人群。他们背井离乡,应征到远离家乡的边关要塞,戍守边疆。由于古代边疆路途遥远,河山阻塞,军需物品只能屯田自给。这时他们就会把家乡农业技术和作物品种带到边疆地区。同时,更为难得的是,应征戍守的将士,常常来自全国南北各地,通过屯田实践,自然地融合了各地农业技术之长,形成整合的农业技术集成,代表了先进的农业水平。当他们服役期满,复员回乡时,又会将在屯田时掌握的先进技术带回各自的家乡,成为农业技术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①。

总之,在历史长河中,通过各种人群的流动,带动了农业技术的传播,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当然,与今天的农业信息传播手段相比,这种人际间的传播效率是比较低下的、缓慢的。不过,古代文明是现代的基础,今天的文明是昨天的延续。人类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走向未来。

[参 考 文 献]

- [1] 曹幸穗,等. 大众农学史[M]. 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
- [2] 刘庆柱. 丝绸之路的考古认知[J]. 经济社会史评论,2015,(2).
- [3] 李水城. 东风西渐:中国西北史前文化之进程[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 [4] 郭 物. 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① 参见曹幸穗等:《大众农学史》,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95-103页。